

雾霾停课没必要搞权力下放



评论员观察

放权多是为了因地制宜,但对于一座城市而言,城东和城西的学校是被同一片雾霾笼罩,停课与否显然应该由教育部门统一安排。在恶劣天气来袭的时候,教育部门就应该承担起保护学生的责任。

霾至,各地都有动作。20日,北京、天津以及我省的菏泽、德州、滨州等地,中小学临时停课。济南的情况比较特殊,由于重污染天气期间教学活动的调整权交给了学校,有的学校19日晚紧急通知次日停课,有的20日宣布下午停课,也有的全天上课。一比较,“伤害”就来了,不停课的学校难免会被批评为“不人性”。

家长的心情可以理解,学校领导其实也有苦衷。虽说权力下放,行动起来却没那么容易,按照“不停学”的要求,停课对日常教学活动的安排影响很大,当然要谨慎行事。针对是否停课,学校之间总是会相互观望。这有点像“囚徒困境”,是停课权下放带来的副作用,以前由教育部门发文,

统一决定是停课还是上课,反倒没这么麻烦。

停课权下放原本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学生,结果却造成这样的麻烦。按照最初的设计,《济南市空气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将预警由低到高分黄、橙、红三级(2016年10月调整为四级),分别对应不同的应急响应级别。红色预警启动I级响应,中小学、幼儿园“应当临时停课”,橙、黄预警(II、III级响应)则要求减少户外活动。停课权下放就等于增加了弹性,未达到红色预警级别,也可以灵活使用停课这一招。

眼下,不同的学校各自为政,有的停课,有的不停,家长也有怨言,如此现象足以证明停课权不宜下放。放权多是为

了因地制宜,但对于一座城市而言,城东和城西的学校是被同一片雾霾笼罩,停课与否显然应该由教育部门统一安排。在恶劣天气来袭的时候,教育部门就应该承担起保护学生的责任。让孩子们少吸点霾,是教育主管部门力所能及的事,也是不容推脱的分内事。

收回停课权,没有了学校这一层缓冲,教育主管部门要直接面对家长和学生的期待,最大的考验就是,是否具有突破整体预警级别、作出停课决策的魄力。其实这里面就隐含着一个问题,让教育部门如此为难的预警门槛,是否有必要做些调整;教育领域应对雾霾的举措,是否有必要跟生产、交通捆绑在一起;是否非要等

机动车限行、施工作业停止、企业减排50%的时候,才能够使出停课这一招?当初的停课权下放就隐含了“降低停课门槛”的考虑,要想彻底解决停不停的问题,还是得从“门槛”上做些文章。

整体性的气质改善,短期内很难实现,这很无奈,却是现实。眼下,能做的要尽可能地保护,既然停课有助于减少重污染对孩子健康的损害,那就应该让停课来得更及时些。20日下午,在预警级别仍然是橙色时,济南市终于下达“停课令”,结束了各区、各校各自为政的状态。这个应急的举措显得有些迟了,期待有关部门能更有效地应对逐渐常态化的雾霾天气。

振兴实业,是中国目标也是世界潮流

大家谈

周俊生

刚刚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即将到来的2017年我国经济发展定下了主基调,相比去年同一时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今年会议提出的一些目标在措词上出现了一些变化。从这些变化中,我们可以捕捉到中央对经济全局的把握和明年经济管理、调控的一些着力点。会议明确提出,要通过创新、质量、品牌、中小微企业等多方面“着力振兴实体经济”。会议公报对此作了详细阐述,表明中央已经把振兴实体经济作为明年经济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并将其作为推动经济转型、实现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一个重点来推进。

实体经济,是相对于金融业等虚拟经济来说的,主要是指工业制造业。我国是一个制造业强国,即使是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的工业制造业也有很大发展,成为国民经济的重

要支撑。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银行业实现了市场化,资本市场等的发展异常迅猛,特别是资本市场,仅仅用20多年的时间就基本追赶上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用几百年时间积累起来的规模。虚拟经济的发展为实体经济创造了较好的条件,特别是资本市场,已经成为帮助国企解困和做大做强、推动民营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工具。

但是,虚拟经济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一定的偏向,一些地方热衷于建立国际金融中心、亚洲金融中心或国内某一地区的金融中心,政策面上忽视了对实体经济的支持,甚至出现了“脱实向虚”的倾向,导致一些地区的制造业凋敝,甚至形成全局性的问题。曾经集中了我国重工业优势的东北三省成为国内各省区经济增速垫底省份,虽然由多方面原因促成,但也深刻地暴露了我国制造业衰退的现实危机。

在从2008年开始的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前,“脱实向虚”曾经是世界性的现象,美国等发达国家以华尔街称雄

世界,制造业大量迁移至发展中国家。但是,一场危机的爆发使美国意识到,仅有华尔街的繁荣是支撑不起一国经济的,甚至可能会拖累国民经济。因此,在奥巴马执政期间,美国采取减税等政策吸引制造企业回到本土,特朗普在竞选美国总统期间把提振制造业作为其“竞选支票”赢得了选民的拥护,在他上任后料将有一批制造企业从各地回迁美国。

尽管特朗普准备实施的很多政策称不上有多么高明,在美国本土和全世界都不乏反对者,但其重振美国制造业的主张和将要推出的措施还是符合当下世界潮流的。对于中国来说,也必须加大振兴实体经济的力度,以此来夯实经济增长的基础。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振兴实体经济开出了很多“药方”,都是切准了中国制造业目前薄弱环节所做出的“对症下药”。但是,振兴实体经济,需要全方位的努力,就中国企业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来说,是企业税负过重。今年

以来,政府在减轻企业负担上推出了很多措施,但收效不是很明显,原因在于这些减负动作都是“零打碎敲”,难有什么作用。税负过重正导致一些中国企业走出国门,最近福耀玻璃公司董事长曹德旺就公开表示准备投资美国,原因就在于在美开厂的税负低于中国。

未来的国际市场竞争,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对实体投资的竞争,各国对企业的不同税收将成为国家在这方面的核心竞争力。中国需要深刻地认识到这种危机,以加快推进减税的行动来为制造业创造更好的营收环境,使中国的实体经济能够在经济转型中发挥中流砥柱的作用。

当然,振兴实体经济,并不是从此就忽视虚拟经济,将其置于可有可无、可强可弱的地位。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并不是对立的,没有繁荣的金融业和资本市场,实体经济的发展也是困难重重的,关键在于虚拟经济要摆正自己的位置,它应该是服务于实体经济而不是凌驾于实体经济之上。(作者为财经专栏作家)

媒体视点

缓解住房供需矛盾 城市要舍得“割让”

无论是特大城市的高房价,还是三四线城市的高库存,背后反映的都是住房供需矛盾。近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特大城市要加快疏解部分城市功能,带动周边中小城市发展”,这是缓解住房供需矛盾的有力之举。

市场分化是当前房地产市场的特征。表面上看,是库存多少不一、房价高低不同,背后却是城市发展资源的不均衡。特大城市因地理位置、产业结构、教育环境以及公共资源的优越性对外地居民具有强烈吸引力,人口净流入量长期处于高位,巨大的“虹吸效应”使特大城市住房供需矛盾尤为突出。

以今年房地产市场去库存的情况为例,市场机构研究发现,有相关产业依托和靠近一线城市的多数城市对人口有一定的吸引力,房地产市场需求旺盛,如东莞、惠州、昆山和廊坊等三四线城市的库存去化周期已在15个月以内;而一些产业和公共资源较为匮乏、就业机会较少的三四线城市,人口正在加速流出,有的库存消化周期还在22个月以上。一线城市“涨价微库存”,二线核心城市“涨价降库存”,三四线城市“平价高库存”,也验证了城市公共资源不同带来的房地产市场差异。

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特大城市要加快疏解部分城市功能,带动周边中小城市发展”,与此同时,中央还要求“提高三四线城市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对农业转移人口的吸引力”。凡此种种,可谓针对房地产市场存在的区域性、结构性问题,精准发力。

政策方向已然明确,重在落实。对特大城市而言,要主动作为。科学制定城市规划,合理设置城市功能,加快产业转移,舍得“割让”部分功能和公共资源给中小城市,并倾心在当地培育使之“落地生根”。作为中小城市,亦应提供良好的教育、工作以及医疗卫生资源,实现“引凤筑巢”的目标。惟有如此,才能有效解决各自的住房供需矛盾,让群众实现安居乐业。(据新华社电,作者郑钧天)

“买书加分”让师道尊严碎了一地

公民论坛

晏扬

眼看期末考试将至,四川宜宾学院选修申论课的同学陷入纠结之中。主讲申论的老师郭五林前不久在微信群里发布通知,称凡购买其编写的申论教材的学生,每买一本书平时成绩加5分,每人最多可以加20分。此举引发部分学生质疑和不满。事情曝光后,郭五林称加分决定已经取消;宜宾学院则表示已对郭五林进行严肃批评,并将进一步调查和处理。(12月20日《新京报》)

我曾做过十几年大学教师,尽管如今很多大学教师早已不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甚至不是“辛勤的园丁”,但在社会评价中,大学教师毕竟是

一个体面的职业,作为教书育人者,总归还会讲求一点师道尊严,顾及一些斯文和脸面。而郭五林的所作所为,则完全将斯文和脸面抛诸脑后,为了卖自己的几本破书,居然将考试分数作为筹码,逼迫学生就范,这种“吃相”实在太难看,让师道尊严碎了一地。

显然,郭五林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卖书,而且是变相的强买强卖。除了学生每买一本书可加5分的“威逼利诱”,还有一个明证——他所教的申论期末考试,内容均围绕他编撰的这本书展开:一是为这本书写一本200字左右的介绍,二是为这本书写一份销售方案,三是就如何学习这本书写一篇议论文。这样的考题堪称奇葩,不考申论本身,而是考怎样卖书,学生选修的本来是申论课程,却变成了郭五林这本书的

营销课程。无疑,郭五林是存心用这样的考题逼迫学生买书,他丝毫不在意学生的申论学得如何,而只关心他的书能卖出去多少。

这也是利用职务之便以权谋私,即利用大学教师手中的授课权、考试权、打分权推销自己的书籍,谋取不正当利益。学生每买一本书可加5分,就是将手中的打分权变现,具体价码是5分30元(该书售价)、20分120元。郭五林将申论课程变成这本书的营销课程,同样是利用教师职务之便以权谋私,即将手中的授课权、考试权赤裸裸地变现,为了谋利不惜将师道尊严踩在脚下。

令人意外的是,事情曝光后,郭五林居然好意思说,“教书是一场盛大的暗恋,你费尽心思去爱一群人,最后却只感动了自己。真是学生虐我千百

遍,我待学生如初恋……”莫非在他看来,这一切都是为学生好?教师利用职务之便谋取私利,莫非是正常而合理的事情?可能的解释是:这样的事情做多了、做久了,便逐渐积非成是,习惯成自然。

当教师可以出卖打分权,当学生可以花钱买分数,这样的教育无疑是可怕的,这样的教师在学生心目中也毫无尊严可言。如今大学教师的待遇并不低,像郭五林这样四处讲课挣外快的教师,收入更是相当可观。人们不苛求教师安守清贫,只讲奉献,但无论清贫还是富有,起码的师道尊严应该要有,教师的斯文和脸面不能丢,以权谋私的事情更不能做。这是教书育人者的本分和应有的节操。

投稿邮箱: qilupinglun@sina.com